

理學與經世

——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

黃克武

- 一、前言
- 二、陸燿與「切問齋文鈔」之編輯
 - (一)陸燿生平
 - (二)「切問齋文鈔」之編輯
- 三、「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
 - (一)「文鈔」學術部分的作者背景與文章結構
 - (二)「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
- 四、「切問齋文鈔」思想之淵源及其在近世思想史上的意義——代結論

一、前 言

明清時代經世思想大放異彩，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型態，其中較為學者關注的對象有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和道咸以降的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人，然而乾隆年間陸燿（一七二六～一七八五）的經世思想還沒有學者作過詳盡而徹底的研究。陸燿在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曾將清初以來討論學術、風俗、財賦、荒政、河防等文章四百餘篇蒐集成篇，出版「切問齋文鈔」，此書成為乾隆末年經世思想的重要著作。

「切問齋文鈔」在近世經世思想史上有二個重要的意義。第一，過去的學者多認為明末清初和道咸以降是經世思想盛行的兩個階段，而兩者之間——康熙一朝程朱理學勃興，乾嘉時期訓詁考據大盛——士人經世之念消沈，然而「切問齋文鈔」的例子卻顯示在考據學風行全國之時，士人的經世傳統並未斷絕，也就是說在明清經世思想演變的過程中並沒有一個「斷層」階段，而是持續地發展。第二，在「切問齋文鈔」出版後的半個世紀（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應賀長齡（一七八五～一八四八）之邀編輯「皇朝經世文編」，魏氏在例言中

※ 本文曾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中宣讀，後承蒙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提供許多修改的建議，特此誌謝。

明言該書之編輯乃仿效「陸氏切問鈔」^①，後來的學者也一致認為「切問齋文鈔」為「皇朝經世文編」的先導；由於「皇朝經世文編」又直接影響清季二十餘種經世文編的編輯，因此「切問齋文鈔」實為清代以「經世文編」表達經世思想的一個重要淵源。就此二者而言，「切問齋文鈔」是一部十分值得研究的著作。

「文鈔」一書卷帙浩繁，目前無法從事全書的研究，因此本文僅就卷首「學術」部分的五十一篇文章先作分析，學術部分是「文鈔」一書的綱領，也可以說是全書的經世理論，研究這一部分的思想無疑地是了解「文鈔」的入門工作。

以學術作為政治主張的基礎是中國思想的主流，先秦時代的經典，如「春秋」、「周禮」、「論語」、「孟子」等都對歷代政治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一直到目前為止，所謂「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的口號，仍然反映出同樣的心態。事實上學術的範圍十分的廣泛，在關注「革命」、「政治主張」、「經世理念」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可能發展的領域。因此以政治主張為前提的學術立場，實際上代表著一種相當特殊的價值取向。透過本文的研究，我們希望了解乾隆末年陸燿在「切問齋文鈔」一書中，是在何種的學術立場之上提出其經世的主張？這個個案的研究同時也讓我們反省中國思想史上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研究「切問齋文鈔」的二手資料並不多，早期日人百瀨泓在「清末の經世文編に就いて」一文中認為「文鈔」是以朱子學為基礎，最近張灝的研究也顯示該書是以程朱理學為基本的意理架構，編者特別強調理學中重實際的一面，但反對玄思冥想的部分，書中認為理想社會的建立，一方面依靠禮儀、風俗的道德力量，另一方面則依靠官僚組織的技術改革^②。

上述的看法仍然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首先就學術立場而言，上述二文都認為「文鈔」是以程朱理學為基礎，但是仔細閱讀該書學術部分的五十一篇文章後，我們發現「文鈔」思想有其複雜而精微的一面。許多學者都曾指出思想不是靜態的信仰，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必須要了解他所面臨的一些可能的選擇，以及他所作的決定；對生長在乾隆末年的陸燿而言，在採取某種「學術立場」之前，曾經面臨了當時中國文化所提供的一些具有意義的選擇，例如儒、釋、道三教是範圍最廣的選擇，在三者之下又各別有一些較特殊的選擇，在每一次的選擇中他肯定了一些觀念，也否定了一些觀念，這些肯定與否定結合在一起，形成陸氏在

① 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臺北，世界書局影印同治十二年版，民國五十三年），例言。

② 百瀨泓，「清末の經世文編に就いて」，收入加藤繁編，池內博士選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座右寶刊行會，一九四一），頁八七七～八九二。張灝，「Three Conceptions of Statedmanship in the Ch'ien-Chia Era」（未刊稿，清華大學「中國思想史上的經世傳統研討會」參考資料）。

學術上的價值取向。本文將描繪陸燿所面臨的一系列選擇，以及他在每一次選擇中所作的決定，從這種脈絡關係中說明「文鈔」一書的學術立場。

其次如果說「文鈔」確實是以理學為基本的學術立場，那麼編者如何從理學之中導引出經世的理念？也就是說如何調和偏重內在心性修養的理學與強調外在事功的經世？一般學者對晚明經世思想興起的解釋多半主張當時學者有感於理學空虛無用，只知坐談心性而無關國計民生，故轉而強調外在事功的重要，開創出經世之風，就此而言，理學與經世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如果說「切問齋文鈔」是以理學作為經世的基礎，這又顯示理學與經世並不完全衝突，因此藉著「文鈔」的個案，本文嘗試重新觀察宋明理學和清代經世思想之關係。余英時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認為思想的演變不完全仰賴外在的刺激，同時亦受內在發展的影響，這種內在的發展他稱為「內在理路」(inner logic)，意指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有的沒有解決，而舊的問題又衍生新的問題，如是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③。余氏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說明：為了解決宋明理學中程朱與陸王之爭，促使學者探求經典原意，而逼出了清代的考證學。但是這似乎不是宋明理學和清代思想之間唯一的「內在理路」。因此在了解「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後，本文嘗試將它放在宋明思想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宋明理學和清代經世思想之關係。

再其次本文希望從「經世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切問齋文鈔」。經世思想最重要的特色是注重「事功」，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確切地了解對各個經世思想家而言，「事功」的內容是什麼？而隨著時代的變動，「事功」的內容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同時，經世思想家認為應該如何處理當前的問題而建立事功？本文嘗試運用兩組對照的觀念來分析他們的立場，第一組觀念是「轉化」和「調適」，前者意指要求徹底的改變而達到完全的成功，後者則為逐步地改善而肯定等級性的成就^④；

③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入《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

④ 轉化與調適的對照請參考 Thomas A. Metzger,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第一章以及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第四章。大致而言，轉化思想重視理想，主張徹底改革。傾向轉化思想的人，在知識來源方面，以絕對真理或抽象原則為基礎。對於現實世界則注意形而上本體論方面的基本組成。他們的目標較高遠，希望獲得完全的成功。他們認為歷史可以清楚地區別為二個層次，一個層次為成功的楷模，另一個層次則為積弊。至於方法的運用方面，他們主張依靠政治核心的力量實施大規模的計劃，或者在核心之外透過學術或思想的影響來改變社會，認為只要使用這些關鍵性的方法，就可以立刻掃除障礙而實現理想。傾向轉化思想的人，其理想與現實之間差距較大，常有強烈的困境感。調適思想重視現實，主張逐步改良。傾向調適思想的人，在知識的來源方面，不以絕對真理為基礎，較強調習俗、慣例和社會共識。對於現實世界則注重形而下的具體構造。他們的目標較平實，肯定部分的成功與等級的成就。他們不將歷史區分為兩個清楚的層次，認為歷史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每個時代都有成功與失敗。在方法運用方面，他們主張採取局部的改革以逐步解決問題而達到目標。傾向調適思想的人，其理想與現實之間差距較小，困境感也較小。

第二組觀念是「政治核心內的改革」與「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因此，本文希望了解「文鈔」的經世思想較接近轉化思想？還是調適思想？該書較強調政治核心內的改革？還是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再進一步地觀察，某種型態的經世思想往往特別關心某個社會階層的利益或者某一地區的利益，在這方面，「文鈔」是否反映出在社會階層和地區上的特色？

上述幾點是研究近代經世思想史時值得注意的一些問題。就「文鈔」的史料而言，必須將全書作通盤性的考察才能完全回答上述的問題。目前本文僅就其中「學術」部分的各文章，作初步的觀察。

最後，爲了呈現「文鈔」經世思想的特色，本文一方面將「文鈔」與明末的顧炎武、黃宗羲和「皇明經世文編」的經世思想作一比較；另一方則嘗試探討「文鈔」與清道光初年「皇朝經世文編」在學術立場上的異同。從這些比較中勾劃出明清經世思想的發展。

在前言之後，將簡單地介紹陸燿的生平與「切問齋文鈔」的編輯，接著再依次分析上述的問題。

二、陸燿與「切問齋文鈔」之編輯

(一)陸燿生平

陸燿字青來，一字朗夫，江蘇吳江人，生於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自幼家境貧苦。其父陸瓚精於漢隸，爲地方上著名的書法家，但並無科舉功名。乾隆初年陸瓚赴京師謀職，因善於書寫，得任「三禮館」謄錄。這時陸燿和他的母親居於江蘇老家，賴母親作一些女紅糊口，家中常無隔宿之糧，多次瀕於餓死邊緣。但陸燿的母親卻極盡全力送他上私塾讀書，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出人頭地而光耀門楣。陸燿亦發奮向學，以古代賢達自期，不因家中貧困而稍挫其志。乾隆十三年「三禮館」的工作告一段落，陸瓚被授爲山西保德州吏目，後又署曲沃縣典史，陸燿和他的母親亦遷居山西。由於吏目和典史的收入十分微薄，這時他們的家境依舊十分貧苦。陸燿幼年時所經歷的窮苦生涯，使他後來出任官職時特別能够體恤一般人民的痛苦^⑤。

乾隆十七年陸燿不負所望，考取順天鄉試，十九年以舉人的身份爲內閣中書，充軍機處章京，自此步入仕途，家境也因此逐漸好轉。

乾隆二十年陸燿的父親因病去世，此後他便一直與母親住在一起。陸氏一生事

^⑤ 本節有關陸燿生平之資料主要參考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八三；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九；清史列傳，卷二十四。

母至孝，母親生病時一定親自在旁侍候。據記載他曾因母親染患痰疾而上書懇請解任歸養，蒙准返鄉，此後數年，他每夜和衣而眠，一聽到母親咳嗽，立刻起床照顧，直到乾隆四十八年母親去世後他才重返仕途。

陸燿是倫理道德觀念相當強烈的人，這種觀念使他特別注重禮儀。他在母親去世後曾寫信向老師請教喪葬儀節，並表示希望所作所為盡合禮制^⑥。他也曾寫信告諭長子有關家中祠堂規制和祭典儀式等事^⑦。有關禮儀的討論成為陸燿經世思想中相當重要的部分。

乾隆三十五年陸燿由中央調至地方，此後十多年他一直任職於山東，其間他特別熱衷於以編輯書籍的方式來表達經世的理想。乾隆三十六年任濟南府知府，編輯「濟南讞讀」一書，書中蒐集各種案例與判決方式，提供官吏審判案件時之參考。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年任山東運河道，在任內編輯了「山東運河備覽」六卷、「任城漫錄」一卷，書中蒐集了許多地圖，以及與治河有關的各種意見；此外他亦編輯了「切問齋文鈔」三十卷。四十年冬天調任山東按察使，再升為山東布政使，任內編輯「甘藷錄」一書，書中教導人民種植甘藷的方法，以及收藏、食用時應注意的事項；乾隆末年「甘藷錄」一類的書籍在民間廣泛流傳，對當時中國人口的增加有直接的影響。

陸燿在任職山東期間，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曾多次遭到官方處分。如在濟南府知府任內，因在監人犯畏罪自縊，結果被處降級；在山東按察使任內，又因「倉庫虧空」、「判案不慎」等事被處「革職留任」。這些事件反映出陸燿宦途中不順利的一面。

陸燿的經世思想與上述官僚制度中的經驗，有密切的關係：

第一、乾隆年間是文字獄相當盛行的時期，中央政府對官員的思想與行為都嚴加箝制。由上述陸燿多次遭受處分的事例也顯示，他處於一個壓力相當大的官僚組織之內，稍有不慎，立遭處罰，這種環境使他產生強烈的「恪尊王制」的心理，亦即在肯定現實政權的前提下談經世。

第二，陸燿除了早年任職中央外，一直擔任地方官，因此他的經世思想大多偏重地方性和社會性事務，極少觸及中央政府的組織或決策等問題。

第三，他在任官期間接觸實際的行政事務，不但有機會看到更多的資料，了解

⑥ 陸燿，「上馮師問喪儀書」，收入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二，頁十一下～十二上。

⑦ 陸燿，「祠堂示長子」，收入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六，頁十二下～十三上。

到問題的複雜性，而且有較充裕的資金，能够出版有關民生、吏治的書籍，「切問齋文鈔」即爲此種環境下的產物。

第四、山東運河道的任官經歷對陸燿經世思想尤其產生深遠影響。運河道屬於技術官，任官期間，他「詳察地勢，博詢耆老，歷考前人論說」，親自接觸治河實務。更重要的是，治河的經驗使他產生一種「切合時勢，隨時變通」的精神。在「任城漫錄」的序文中，他表示：

顧今昔情形不同，前後設施互異，或彼時所未便而今享其利，或往日所重賴而茲轉爲梗，其不可執陳方而求實效也明矣^⑧！

在「切問齋文鈔」的序文中他更以河道的古今變遷，強調不應泥古，要知所變通^⑨。

乾隆四十九年陸燿調升湖南巡撫，赴任時行李僅「布被一襲，衣兩篋而已」！次年湖南發生旱災，陸燿一方面上書請求減免稅收，另一方面則戒殺清齋，日日強行求雨，終至積勞不起，因病去世。

陸燿死後的四十餘年，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書中收錄了陸氏著作二十一篇^⑩。他的思想不但反映出乾隆末年士人所具有的經世觀念，也對道咸以降的經世思想產生直接的影響。

(二)「切問齋文鈔」的編輯

「切問齋文鈔」的編輯經過相當長的一段蘊釀與籌劃階段，大約從乾隆三十年前後開始，陸燿就陸續地邀請友人協助蒐集清初以來有關經世的重要著作，至四十年選輯排比，編成「切問齋文鈔」。該書的編輯，與乾隆三十年以來的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之環境有直接的關係。

政治方面，乾隆初期文治武功鼎盛，二十年代盛風猶存，但三十年代則開始有衰微的跡象。據汪輝祖（一七三一～一八〇七）的回憶，乾隆二十年代吏治澄清，未有唯阿從事者，但是三十二、三年以後，「已而稍稍委蛇，又數年以守正爲迂濶

⑧ 吳江縣續志，卷三十四，頁七上～下。

⑨ 切問齋文鈔，序。

⑩ 收入的文章爲「復戴東原書」、「畫天人編後」、「鹵簿名物記」、「喪服」、「上馮師問喪儀書」、「贈吳君佩之序」、「家祭」、「祠堂示長子」、「祠堂再示長子」、「與巽齋論行述書」、「答王惺齋論家祭書」、「再答王惺齋論家祭書」、「禱祠」、「文昌祠說」、「論回民啟」、「伎術」、「答章觀察問保甲啟」、「題五氏寫本地圖後」、「請濬泉渠狀」、「論引沁入衛之患」、「請修河渠志狀」；其中列入「學術」部分的有二篇，「禮政」部分十四篇，「兵政」部分二篇，「工政」部分三篇。

矣」^⑩。在這同時，地方上也出現了一些零星的叛亂，例如乾隆三十九年有山東王倫之亂，陸燿目睹這場叛亂，後來亂事雖然迅速地被清軍平定，但在陸氏的心中卻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般人多將乾隆末年的衰微歸咎於和珅（一七五〇～一七九九）亂政，因此推想「切問齋文鈔」的編輯或許與和珅有關，但實際上乾隆四十年時，和珅只是皇帝侍衛機構中的一名軍官，尚未掌權，他的崛起是在乾隆四十五年出任戶部尚書以後的事^⑪。因此，「切問齋文鈔」可視為和珅亂政之前的預先警告，當時陸燿已敏銳地感覺到社會、政治的衰微，因此編輯「文鈔」一書，力圖挽回。

在社會經濟方面，中國人口在乾隆末年已高達兩億七千萬，隨著人口的增加，都市化和商業化的程度也日益加深。尤其在長江下游地區，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都蓬勃發展，商人的地位也逐漸上升。但在這同時傳統儒家儉樸、重義輕利等觀念卻逐漸不為人所重視。陸燿編輯「文鈔」的動機之一，是企圖在社會逐漸步入高度都市化與商業化的過程中，強調儒家倫理的實現。

在學術方面，康熙時期官方力倡程朱理學，朝野大師輩出，但程朱陸王之爭並未斷絕，彼此互相抨擊，大抵程朱學派較占上風，陸王學派則深感壓力。乾隆末年最為盛行的學風要推訓詁考證，陸燿與考證學大師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為好友，常彼此致書討論問題，而見解卻頗不相牟。在考證學風披靡之下，士人羣趨於聲韻訓詁，這時少數士人不滿考證學風，轉而另謀發展，主要有四個發展方向：

一為常州今文學。創始於莊存與（一七一九～一七八八）、孔廣森（一七五二～一七八六）兩人探研公羊學，講微言大義，為清末今文學復興之先驅；但廣森早逝，存與之學則僅傳子孫，故乾隆末年今文學仍處於萌芽階段，藉今文而倡經世的風氣要到道咸以後才開始興盛。「文鈔」經世思想與今文學派並無直接關係。

二為浙東史學。此派溯源甚早，乾嘉時期的代表人物為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和邵晉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但「文鈔」出版時，章、邵二人思想均未成熟，影響力甚小。

三為佛學。乾隆年間佛學亦十分盛行，當時甚至有人認為「今士大夫靡不奉佛」，其中代表人物有彭紹升（一七四〇～一七九六）、汪縉（一七二五～一七九二）、羅有高（一七三四～一七七九）等人，均尊奉淨土，力主會通儒釋。

⑩ 汪輝祖，學治臆說（叢書集成版），頁二。

⑪ David S Nivison, "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11.

四為經世。本文所要探討的陸燿即為此種主張的代表人物。此外還有陳宏謀（一六九六～一七七一）和較晚的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等人。

「切問齋文鈔」即出現在上述的環境之中。乾隆四十一年該書出版，卷首載有編者所撰「例言」，說明選文的標準。歸納起來有下列四點：第一，「立言貴乎有用」，故書中不注重文詞的瑰麗工巧，專選切合實用的文章。第二，不分畛域，明代遺民如張履祥、陸世儀、孫奇逢、張爾岐、李顥等人雖「高蹈邱園，不求祿仕」，但所撰文章切合當代所需，故仍予收錄。第三，態度開放，對於同一問題若有二種意見，則兩說並存，以供參考。第四，言論有輕重緩急，因此對同一主題的文章，在編排上依其重要性略分先後，而不以作者名望或作品時間為標準^⑬。

在上述的標準下，編者選錄了四百零六篇文章。為了使全書較有系統，編者設計了一種新的編排方式，以問題為中心，將討論同一問題的文章集中在一定項目之下。這種編排方式與明末幾社諸子所編輯的「皇明經世文編」有明顯的不同，「皇明經世文編」是以人物為分類標準，將文章列於各人之後，類似傳統的文集。「文鈔」的編排方式無疑地較具實用性，讀者只要翻閱某一項目，就可以找到與此相關的各種意見。因此道咸以後的「皇朝經世文編」、「續編」、「三編」、「四編」、「五編」、「新編」等書都繼承了「文鈔」的編排方式。在「經世文編」的發展史上，以類別為中心的分類法，使「經世思想」落實為一種更有系統的學問^⑭。

「文鈔」全書共分為十二目、三十卷，共約四十四萬字，各目的名稱及其卷、篇、頁數和頁數比例如下表：

名稱	學術	風俗	教家	服官	選舉	財賦	荒政	保甲	兵制	刑法	時憲	防河	總計
卷數	3	5	2	1	3	4	2	1	1	1	1	6	30
篇數	51	99	36	18	38	48	30	26	13	19	17	11	406
所佔頁數	69	121	41	32	72	101	66	45	16	25	23	125	736
頁數比例	9.4%	16.4%	5.6%	4.3%	9.8%	13.7%	9.0%	6.1%	2.2%	3.4%	3.1%	17.0%	100%

從表中的分析可以讓我們較清楚地了解對陸燿而言，所謂的「事功」包括了那些項目。由各目所佔頁數的比例可以發現河防、風俗、財賦三個部分是「文鈔」一

^⑬ 切問齋文鈔，例言。

^⑭ 參考拙著，「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期（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書關懷的重心，而河防與風俗高居首位，顯然與編者個人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份量次重的是選舉、學術、荒政等部分，其它的六個部分份量較少。

「文鈔」一書思想十分複雜，目前不克從事全面性的研究，因此本文選就其學術部分先作分析。

三、「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

在直接分析「文鈔」學術立場之前，我們先了解學術部分的五十一篇文章是由那些人寫的？編者又如何來安排它們？

(一)「文鈔」學術部分的作者背景與文章結構

「文鈔」學術部分五十一篇文章，共有作者三十五人，編者在每人所撰的第一篇文章之前，都簡單地介紹作者的籍貫、功名、官位與重要著作。依靠此簡歷及其它的資料，我們可以對這三十五位作者有一個初步地了解^⑤：

1.就作者籍貫而言，徧及南北十二省，其中籍貫在江蘇省的作者有十位，浙江省有七位，兩者合計幾達半數，其次河南、山東兩省各三位，河北、湖北、福建三省各二位，其它各省僅一位。這種情形顯示「文鈔」學術部分主要反映江浙地區士人的意見。

2.就作者生卒年代而言，生於一六一〇至四〇年代的作者最多，共二十一位；一六五〇至八〇年代次之，共八位。從朝代比例上來看，生於明末者佔五十四%，生於清初者佔四〇%，另有二位生年不詳。就卒年而言，卒於一六七〇至一七一〇年代的人最多，共二十四人；一七二〇至九〇年代則僅有八人。總之，「文鈔」學術部分的作者主要活動時間，約為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亦即康熙一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而「文鈔」出版時仍在世的作者，只有二位。

3.就科舉功名而言，進士出身的作者高達二十位，舉人和諸生出身者合計七位，以布衣應博學鴻詞者有潘耒和朱彝尊二人，而無科舉功名的有張爾岐、陸世儀、計東、勞史等四人。

4.就仕宦經歷而言，曾出任官職的作者有二十二位，其中中央官十七人，地方官五人；而未曾入仕者有十一人。可見編者在選擇文章時能兼顧在朝者與在野者的意見。

5.就作者之學術淵源而言，我們將三十五位作者分為六類，凡在理學方面有較

^⑤ 作者之名單與背景資料請參考本文附錄。

鮮明之主張者，劃歸程朱學派、陸王學派和朱陸調和三類；在理學方面無特殊主張而以詩文著稱者，劃歸文人；史家或一般官吏列入其他；最後一類是不詳。資料顯示，對理學有明顯主張的作者，有十九人，其中支持程朱學說的學者最多，有張爾岐、陸隴其、李光地、陸奎勳、張伯行、魏裔介、蔡世遠、魏象樞、熊賜履、陸世儀、勞史、張履祥等十二人，清初理學名家幾乎囊括殆盡；支持陸王學說的作者有邵廷采、孫奇逢、彭定求、李顥等四人；主張朱陸調和者，則有陽斌、田蘭芳、陳道三人。文人類和其他類共十四人，較著名的有潘耒、沈德潛、朱彝尊等。

6.就每位作者所撰篇數而言，撰寫一篇的作者有二十三人，二篇的有七人，三篇的有五人。篇數最多的作者為張爾岐、田蘭芳、計東、姜宸英、李顥等。

以上是「文鈔」學術部分作者的背景，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除了收錄不少官宦的著作之外，也收錄了一些並無科舉功名之人的文章；在學術淵源上，作者之中除了程朱理學家之外，也包括好幾位陸王學者、文人、史家等，蒐集可謂廣泛。陸燿將他們所撰寫的五十一篇文章編入三卷，各卷均環繞著幾個重要的主題。

第一卷有十七篇文章，可以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張爾岐所撰「辨志」和「答友人書」二文，前者開宗明義地指出士人立志的重要性，後者則藉著顧炎武所謂「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以及「篤志力行」等語作為士人行事之準則。第二組從陸隴其的「思辨錄序」到陸奎勳的「與王繪先論學書」等八篇文章，以理學中的「程朱陸王問題」為討論的重點。第三組從張伯行的「與陳玉立書」到田蘭芳的「唐幼章句釋感應篇序」的七篇文章，主要討論佛道思想。

第二卷共計十九篇文章，也可以分成三組。第一組從湯斌的「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到沈德潛的「書院課士疏」等六篇文章，討論教育問題。第二組從陸世儀的「蘇學景賢錄序」到田蘭芳的「路先生墓碑」等九篇文章，討論為師之道與師生關係。第三組從姜宸英的「友說贈計子甫草」到計東的「送張生屨如南歸序」等四篇文章，以士人的交友問題為討論焦點。

第三卷在目錄上有十七篇文章，但其中潘相和李渭清所撰二文有目無文，故實際上只有十五篇，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從王鉞的「六經論」到沈起元的「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等十篇文章，討論讀書方法並開列必讀書籍。第二組從李顥的「立品說別荔城諸生」到蔡世遠的「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等五篇文章，著重於討論著述與文人品格方面的問題。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發現文章的編排井然有序，第一卷談基本的學術立場，第二

卷談教育，第三卷談讀書、著述。各卷皆有清晰的主題，且所選文章亦切合題目。

了解作者背景與文章結構之後，下面我們進一步分析「文鈔」前三卷文章中所反映的學術立場。

(二)「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

近年來許多學者對「文化」往往採取一種相對性的看法，認為「文化」是人類在特定時空下的產物，是一種「選擇」；亦即在某一個文化中具有正面意義的東西，在另一個文化中可能具有負面意義，甚至是不存在的。因此了解一個文化，應嘗試了解它所提供的可能的選擇，以及某些人們所作的不同決定。

對生活在乾隆時代的陸燿而言，他的學術立場就是環繞著一些中國文化所提供的選擇。首先，作為中國文化中的知識分子，他面對的是儒、釋、道三教，陸燿選擇了儒家，同時排斥佛道，反對三教合一。其次，作為一個儒者，他可能偏重義理、詞章、考據、經世四個不同的方向，在義理方面他肯定先秦儒家，但對宋明理學則抱持著愛憎交雜的態度；對於詞章和考據他皆表不滿，他最強調的選擇是注重外在事功的「經世」。再其次，作為一個經世思想家，他不同於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偏重徹底改革政治核心的轉化思想，也不同於「皇明經世文編」偏重以政治核心為基礎的調適思想；若將陸燿的選擇與魏源所編輯的「皇朝經世文編」作一比較，兩者之間也有一些相當有意義的異同。下面我們依次描述陸燿的三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接受儒家思想，排斥佛道，反對三教合一。

「文鈔」中的許多觀念基本上是源自儒家傳統，而與佛道思想有所不同。

儒家思想與佛道二教最顯著的不同是入世與出世的差異。「文鈔」思想具有強烈的入世精神，希望在現實的世界中實現最高的理想，因此個人終極的目標是成聖成賢，而非成佛成仙。聖賢之所以值得敬佩，一方面固然由於個人道德與知識上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個人對社會的積極貢獻。

在入世思想影響下，儒家思想主張「德治」，亦即「大學」所謂以修身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基礎，認為政治是個人人格的擴大。在「文鈔」中，各文特別以「體用」的觀念表達這種理想，如「有體有用」、「明體達用」、「體用兼備」等字眼反覆地在書中出現^①。體用二字在宋明理學中應用得非常多，但「文鈔」中二字的涵義與理學中的涵義並不相同。「文鈔」中所謂的「體」主要指個人道德與知識的修養，較少宇宙論的意味，而「用」則確指外在事功。故「體用兼備」即為「兼內

^① 見切問齋文鈔，卷二，頁五上；卷二，頁九上；卷三，頁八下。

外」，是指將個人內在道德、知識修養與外在的事功貫通為一。「體用兼備」的理想實為「文鈔」經世理論的核心。

此外儒家傳統中一些較重要的觀念在「文鈔」中仍然存在。例如：認為政治核心是比較一元的，在此之外沒有合法而且具有政治意義的羣體；認為經典之中蘊藏了絕對的真理，而人類可以了解其中的真理，這種觀念可以稱為「樂觀主義的認識論」，與西方懷疑主義的傳統有明顯的不同；認為人沒有原罪，而且本性是善的，經過人為的努力可臻聖賢之境；認為社會活動是一種環繞著「禮」的活動等等^①。這些看法基本上是源於儒家傳統，而與佛道思想不完全一致。

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文鈔」進一步地排斥佛道。

首先是批評佛道的出世思想，認為出家之後拋棄五倫，不理世務，只知追求「前知」、「頓悟」、「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空虛寂滅」、「長生不死」等，「文鈔」作者認為這些理想非常自私，只是追求自我的解脫，而忽略了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所以即使成佛作祖，「亦僅為超然世外之人耳，曾何當於治世之大道哉？」^②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出家之後多數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依賴別人奉養，試想人人如此，世界上怎會有衣服、食物？因此他們認為佛道思想比楊朱、墨翟的「無父無君論」還要可怕^③。

與出世思想相關的另一個批評是認為佛道思想討論明心見性，陷入「高談語上」，「有內無外」的弊病^④。其中張伯行在「與陳玉立書」中，引述羅欽順（一四六六～一五四七）由佛轉儒的故事，說明禪宗在通體流汗下的頓悟經驗，不如儒家對心性的看法那麼踏實^⑤。

「文鈔」對佛道思想的第三個批評在於「福善禍淫」的觀念。此說自明中葉袁黃（了凡，一五三三～一六〇六）的提倡而大為盛行。「文鈔」中的反對意見有以下兩種：

第一種看法基本上肯定「福善禍淫」，但是反對佛教徒將「善」界定為狹義的「持齋、誦經、施舍、禮拜」，而認為儒家的倫理道德，才是真正的「善」。如黃中堅在「佛氏論」一文中認為：

如徒以持齋、誦經、施舍、禮拜而已，則設有孝子、悌弟、忠臣、貞婦，其

^① 以上各項儒家思想的基本預設 (premises) 參考墨子刻教授，「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一個休謨後的看法」，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期（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②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八下～十九上；頁二十四上～下。

^③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二十三上。

^④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一下。

^⑤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七下。

人而不從事於此，佛將遂從而禍之乎？又設有人焉，恃其懺罪祈福之有具也，而恣行不善而無所忌，佛將遂從而福之乎②？

第二種看法則完全否定「福善禍淫」說之價值，認為此說使人基於功利之念而為善，與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念相衝突。張爾岐在「袁氏立命說辨」一文中，大力駁斥這種看法：

信其說者覲其報而行吾善……終日術其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為市，其心之為公為私，為誠為偽，不待辨而較然也③。

張氏也反對以福善禍淫之說引導「中下之人」為善：

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苟不自進於善，徒曰習其私者偽者，乃適成其為中下耳。士人讀書立身將以中下自域耶？君子教人將盡中下之人驅之中下耶④？

田蘭芳在「唐幼章句釋感應篇序」中也持同樣的看法，他認為福善禍淫之說雖然可以鼓舞人向善，但是「一旦報我少爽，而其意必怠，其功必阻」，所以還是應該堅持儒家的立場，天下之事該做就做，不該做就不做，「不以福至而怠，不以禍至而沮，俛焉孳孳，殫壽不二」⑤。

「文鈔」不但反對佛道思想，也反對晚明以來「三教合一」論，李光地和張伯行都在文章中指出，三教合一之說是捨棄聖賢之說而投奔異端，使儒者「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反」，提倡此說將會禍害世道人心⑥。

以上是「文鈔」對佛道思想的批評，上述的批評不一定正確，甚至有些地方帶有誤解，但這種看法正反映出「文鈔」肯定儒家傳統，反對佛道思想的學術立場。

第二個選擇：在儒家傳統之內，對理學抱持愛憎交雜的態度，要求返回先秦儒學；駁斥考證與詞章之學，強調經世的重要。

「文鈔」學術部分選錄了許多清初理學家的作品，但這些文章並不完全肯定宋明理學，而是抱持著一種愛憎交雜的複雜態度。

「文鈔」對理學的不滿主要在「門戶之見」、「高談語上」、「虛偽附會」等弊病。

②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二十三下。

③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二十五下~二十六上。

④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二十七上。

⑤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二十七下。

⑥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五上；頁十八上。

門戶之見意指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因宗派意識而使兩派學者互相排擊，「文鈔」中許多學者對此均表不滿，如陳道認為「聖道大而無方，別門戶以求之，非私則隘」^{②⑦}；湯斌更沈痛地表示「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嫚罵爲能者也」^{②⑧}。出身陸王的邵廷采則認爲，漢唐宋明的黨爭是由於同時共事，意見不合而產生，但是朱熹去世已五百多年，王陽明去世也將近二百年，兩人均爲一代宗師，今日學者卻爲此而激烈辯論，實無意義^{②⑨}。

高談語上，意指理學家過度鑽研形上學，析論性命與天道，但忽略了實踐。所以雖然言論精微高妙，但「析愈精而說愈紛，於己於人究無裨益」^{②⑩}。

虛偽附會也是當時理學的一種弊病，這是理學與功名利祿相結合之後產生的。因此有些人專研理學只是爲了作官，也有人隨聲附和，實際上言行相背、口是心非^{②⑪}。

爲了解決上述的弊端，「文鈔」各文首先主張放棄門戶之見，採取尊崇程朱但不排擊陸王的立場。例如湯斌、陸奎勳、田蘭芳均認爲「有孟子斯可以闢楊墨，若以儀秦而爲距楊墨之言，未信爲聖人之徒也」，所以學者應先將其本份之內的事做好，若能在實際事務上有所表現，則不必「言朱斥王」，人們自然會接受程朱理學^{②⑫}。「文鈔」各文作者中，宗派意識最強的是李光地，但書中選錄李氏「朱陸析疑」一文，卻力主朱陸思想並非背道而馳：

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②⑬}！

由此可見「文鈔」放棄門戶之見的立場。

其次，爲了解決「高談語上」和「虛偽附會」的弊病，「文鈔」強調先秦儒家中較平實的修身觀念，以挽救理學的玄虛。如邵廷采便直接地提出這種主張：

今之講學者患在喜於語上，而所以由之者疏，故吾欲以夫子之四教糾而正之，自宋以後語錄諸書一切且束勿觀，而惟從事於六經孔顏曾孟之教^{②⑭}。

②⑦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二下。

②⑧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六下。

②⑨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上～下。

②⑩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二下。

②⑪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六上～下；頁十上。

②⑫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七上；頁八下；頁十六下。

②⑬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三下。

②⑭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二上。

這種較平實的修身觀念具體地表現在「行己有恥」這一句話上，張爾岐在「答友人書」中認為：

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真偽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窅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⑤。

基於同樣的原因，「文鈔」特別主張士人應研讀「小學」。「小學」乃專爲孩童而作的教科書，內容爲「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朱熹十分重視這本書。「文鈔」中好幾篇文章都提到「小學」的重要，其中蔡世遠的文章說得最詳細：

「小學」一書爲敦倫飭行之要，修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以養正之言，虛僞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⑥。

但是「文鈔」是否完全強調具體的道德行爲，而不談形上而玄虛的心性之學？這又不然，「文鈔」的看法似乎是「下學而上達」，也就是說從具體的道德實踐開始，可以一步一步地進到「天人之微」；「文鈔」所反對的是只知天人之微，卻忽略道德實踐。所以張爾岐認為：

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⑦。

類似的意見還有：

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⑧。

始之以灑掃應對，繼之以禮樂射御，終之以文行忠信，務使人循循於人倫日用之常，而初不求其速化，及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然後詔之以一貫之道^⑨。

由此可見「文鈔」並沒有完全放棄宋明理學中形上學的部分，只是主張經由具體的道德實踐逐漸體認性命、天道之學。

爲了挽救理學的弊病，「文鈔」除了鼓勵道德實踐外，也強調理學中重視實際

⑤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四上。

⑥ 切問齋文鈔，卷二，頁四下。其他談到小學的文章見卷一，頁五上；卷二，頁二十三下；卷三，頁九上。

⑦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四上。

⑧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五上。

⑨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二十四上。

事功的傳統。陸奎勳在「與王繪先論學書」詳細地舉出陸九淵、王陽明、朱熹三人在實際事功上的表現。陸九淵「居家孝友，在官愛民，躬行實踐」；王陽明「經濟事功，彪炳史冊」；朱熹「持身之嚴，教家之肅，正心誠意以格君，建書院刊六經以教育士人，舉行社倉，興復水利，蠲減木炭稅銀以利濟民生」。陸奎勳認為上述三人不但具有內在的涵養，亦有外在事功，是理學家最佳的楷模。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可以了解「文鈔」對宋明理學的複雜態度，它一方面批評理學門戶之見、高談語上、虛偽附會等弊病，主張「行己有恥」這種較平實的修身工夫；另一方面又從「下學上達」的觀點肯定心性之學的價值，並以象山、陽明、朱子的實際表現說明理學中重視事功的精神。這種對理學的複雜態度已與宋明理學的基本看法有所不同，而較接近「實學」的傳統。

以上述的態度為基礎，「文鈔」進一步批評詞章與考證之學。

詞章之學意指重視詞藻華麗的詩文而言。其缺點在於與實際生活脫離關係，因此「文鈔」認為士人不應以「文人」、「詩人」作為一己之志向，尤其不應藉著詩文而博名謀利；而唐代以後詞章與科舉結合，只要「一字之奇，一韻之巧」即可獲得官位，難怪士風輕薄浮華^④。所以陸燿在序文中感慨地表示：

至如馳騫詞章，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神為此不急，道不終晦乎^⑤！

對於乾隆時期最為盛行的考證學，陸氏亦表不滿：

然其弊也有為訓詁之文者……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解釋，既有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無可憾，而復擿摭細瑣，扶剔幽隱，人各一篇，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誦無益毫毛，此何為者也^⑥。

在儒學傳統內「文鈔」最強調的選擇是「經世」。經世思想的特色是注重外在事功，但「文鈔」對事功的態度是以「兼內外」為前提，亦即絕非只重事功而忽略道德修養。前文曾討論到「文鈔」從「體用兼備」的角度要求重視內在修養（體）與外在事功（用）；並提及書中藉著陸九淵、王陽明與朱熹的事例說明卓越的理學家都有傑出的事功表現，這些看法都顯示「文鈔」經世思想中「兼內外」的特色。

④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十六上。

⑤ 切問齋文鈔，卷三，頁十二上～下。

⑥ 切問齋文鈔，編者自序。

⑦ 同上。

此外「文鈔」對事功的重視還與其他的兩個特點結合在一起，一是強調當代（今）；一是具有變通精神。爲了強調這兩個密切相關的看法，「文鈔」致力於破除泥古的觀念。例如馮浩在序文中指出：文章的價值在於是否能合於「道」，而道無古今之別，因此愈合於道的文章就愈有價值，這也顯示古代的文章不一定勝過當代的著作^④。陸燿也指出：「古」與「道」不能劃一等號，因爲「事固有與古相違而於道適合者」，他更以河道的變遷來作說明：

譬諸河焉，碣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⑤！

這些看法都反映出強調當代與重視變通的精神。

以上是陸燿在儒家傳統之內所作的選擇，他反對詞章與考證，對理學抱持愛憎交雜的態度，一方面修正理學，另一方面亦繼承理學，並主張以經世作爲學術立場的核心。

第三個選擇：在經世思想的範圍內，「文鈔」強調針對地方性和社會性問題提出逐步的改革方案，但同時又要求徹底地改造士人的心志。因此它與十七世紀「皇明經世文編」以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經世思想有所不同。陸氏這樣的選擇爲十九世紀初年「皇朝經世文編」的出現奠下初步的基礎。

在前言中曾談到本文嘗試以轉化——調適以及政治核心的改革——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兩組觀念來分析經世思想。這兩組觀念交織而成四種類型：

1. 強調政治核心內之改革的轉化思想。
2. 強調政治核心之外改革的轉化思想。
3. 強調政治核心內之改革的調適思想。
4. 強調政治核心之外社會性行動的調適思想。

就此而言「文鈔」經世思想偏重於上述第四個類型，但同時它亦接受第二個類型。

在目標方面，「文鈔」並不強調獲得完全的成功，而是肯定部分的成功並追求等級性的成就。所以個人最高的理想雖然是成聖成賢，但若無法成爲聖賢則作一「醇儒」或者成爲一個有爲有守的地方官亦值得尊敬。所謂：

學者苟能習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

^④ 切問齋文鈔，馮浩序。

^⑤ 切問齋文鈔，編者自序。

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⑥。

在羣體的目標方面，過去學者多艷稱「三代」，以之作為理想社會的代稱。但是在「文鈔」中很少提及三代，雖然也有文章談到「治世」的理想，不過並不是指完美無缺的社會，而是一個能够改革弊端，使人民生活不虞匱乏，道德不致墮落的社會。

如何能達到上述的理想？「文鈔」認為有賴各種政治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出版

出版意指蒐集有意義的文章結集出書，藉此影響別人的觀念而達到社會改革的目的。「文鈔」中以「文以載道」的觀念來說明出版工作的意義。如馮浩認為古今的文章有各種變化，但是「道」卻是永恆不變的；因此文章的價值不在於時間的先後，而在於是否能够「明道」，故愈合於「道」的文章就愈有價值，所以他認為：

道無古今之殊，文亦無古今之別，謂今之文必不逮古之文者，是舍道以言文^⑦。

故當代許多「明道」的文章有其價值，而蒐集這些文章出版將有助於改良當前政治與學術的弊病。「切問齋文鈔」一書就是這種觀念的實踐。

(二)教育改革

「文鈔」對於當時教育問題十分關注，但它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不是大規模的改制，而是在接受現行制度的前提下從事逐步的調整。這種態度明顯地表現在「文鈔」對科舉制度的態度之上。書中收錄了不少批評科舉考試的意見，例如他們攻擊當時的學校或書院淪為準備考試的工具；教師教學專取坊間雕刻轉相授受，不教經史實學；學生讀書也只重視和考試有關的部分，「不出題者直視為無用」^⑧。不過「文鈔」中並沒有人主張廢除科舉制度，他們認為不是科舉制度本身不好，只是在運用上產生了流弊。例如夏之蓉認為：

國家以制舉業取天下士，非以困天下之才，使之相率而出於無用也……故制舉業者所以研天下之心，而求古人之意，道也，非以為藝也^⑨。

張伯行也說：「或曰舉業可廢乎，予曰不可廢也」^⑩。這都反映出「文鈔」是在肯

^⑥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三下。

^⑦ 切問齋文鈔，馮浩序。

^⑧ 切問齋文鈔，卷三，頁四上。

^⑨ 切問齋文鈔，卷二，頁十二下。

^⑩ 切問齋文鈔，卷三，頁六上。

定當前制度的前提下從事改革。「文鈔」認為解決教育問題不是依賴皇帝或中央官員，而是要靠地方上的「學使」、「教師」、「朋友」三個角色的努力。

學使是指各地方的學官，他們負有指導學校教育之責，潘耒在「送田綸霞水部督學江南序」中特別強調學使的重要性：

愚以為時文俗學之陋，破壞天下之人才，百年於茲，矯而振之，必自學使者始……經之以經，緯之以史，驅天下而為通經學古，明體達用之士，世道其有賴乎^{⑤1}！

第二個重要的角色是教師，「文鈔」對當時教師地位的低落深表沈痛，田舍翁以數文相邀，士人則卑屈往教；故朱彝尊感嘆地說道教師的地位甚至不如教授音樂的「吳下歌板師」^{⑤2}。此外師生關係有如市場交易，「為師者以弟子為外府，為弟子者視師為保傭，交征以利而滅其誠」^{⑤3}。為了解決上述的弊端，「文鈔」認為應建立師道尊嚴，只有學生謙恭來學，沒有教師卑屈往教。在教學方面，教師應努力盡職，循循善誘，尤其應仿效宋代胡瑗（九九三～一〇五九）經義與治事並重的教學方式，以造就「明體達用」之人才^{⑤4}。

第三個重要的角色是「朋友」，因為朋友可以「濟師道之所不及」，所謂「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所以朋友應互相砥礪，共勉於道，更應互相勸諫，「時進以激直之言，拂逆其意」；另一方面對於友人的勸諫則須虛心接納^{⑤5}。

「文鈔」對於學使、教師、朋友三個角色的強調顯示該書對政治核心之外社會性活動的重視。

上述出版與教育改革都反映「文鈔」思想中適應現實狀況而採取逐步改革的經世途徑。但是「文鈔」思想亦深受理學的影響，故亦傾向主張徹底改造的轉化思想，然其轉化之焦點不是中央政府的組織，而是士人的「心志」，亦即將「心志」視為改革世界的關鍵，認為只要能夠立下正確的志向，順此發展必然能達到完美而理想的境界。這種觀念屬於上述的第二類型，為強調核心之外的轉化思想。「文鈔」學術部分第一篇文章張爾岐所撰「辨志」一文明顯地抱持著這種看法：他認為人初生時沒有什麼差異，但長大之後有的人對社會有卓越的貢獻，有的人則禍國殃

⑤1 切問齋文鈔，卷二，頁六上～下。

⑤2 切問齋文鈔，卷二，頁十六上。

⑤3 切問齋文鈔，卷二，頁十九下。

⑤4 切問齋文鈔，卷二，頁二下；頁九下，頁十一上；頁十九上。胡瑗在各文中重複出現，形成文鈔教育思想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形象。

⑤5 切問齋文鈔，卷二，頁二十上～二十二下。

民，爲民蠹害；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張氏認爲關鍵在於個人的志向：

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輻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

因爲志向有發展的潛力，志於道義則「每進而上」，志於貨利則「每趨而下」，所以他感嘆地說道：

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⁶⁶！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文鈔」經世思想結合了上述第二類型與第四類型，亦即爲了解決當前問題而建立事功，「文鈔」認爲一方面依賴政治核心之外各種如出版、教育改革等社會性行動，逐步改良現況；另一方面則主張在思想或觀念上作一徹底改造，希望士人能立定志向，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因此「文鈔」學術部分的經世思想結合了核心之外「調適」與「轉化」兩種趨向，形成一種相當特殊的型態。

如果將「文鈔」經世思想與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的經世思想作一比較，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它的特色。

十七世紀的經世思想可以幾社諸子所編的「皇明經世文編」以及顧炎武、黃宗羲等大儒者的經世思想爲代表。

「皇明經世文編」編於明崇禎年間，全書收錄明代臣僚奏疏三千餘篇，爲明末經世思想的重要著作。根據許淑玲的研究，該書特別關懷官僚制度的行政技術，書中主張「以昭代之人文，經昭代之國事」，反對泥古而不知變通，全書討論明代賦役、刑法、漕課、軍政、學校、祭典等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但是書中並不主張全面性的制度改革，僅是根據各種實際問題提出局部的改良意見⁶⁷。

從「轉化」和「調適」的對照來看，「皇明經世文編」偏向逐步改良的調適思想；從「政治核心的改革」和「核心以外的社會性行動」的對照來看，「皇明經世文編」雖然同時收有討論中央和地方事務的文章，然其側重中央政府的官僚行政。因此「皇明經世文編」的經世思想屬於「強調政治核心的調適思想」。

「文鈔」與「皇明經世文編」相同之處在於兩者均傾向調適思想，主張逐步改良；「文鈔」中許多討論官僚制度的文章與「皇明經世文編」關懷的重點十分類似。但是「文鈔」所偏重的經世途徑不是政治核心的改革，而轉移到政治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因此書中所涵的範圍進一步地擴展到教育與學術的領域，而特別關

⁶⁶ 切問齋文鈔，卷一，頁一上～二下。

⁶⁷ 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注地方性和社會性的事務。從兩書的作者背景來看也反映出同樣的現象，「皇明經世文編」的作者均為政府官員，「文鈔」的作者除了一部分官員之外還包括了不少全無科舉功名的在野學者，這也顯示「文鈔」關懷重點的轉移。

十七世紀另一類型的經世思想家是當時享譽全國的大儒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顧、黃面對明朝覆亡與異族入主兩大變革，對傳統的政治結構提出許多深刻的反省。他們兩人的思想十分複雜，但有一共同的特色，亦即以三代的理想批判當代的政治，因此他們以封建、井田等制度為基礎規劃出一套新的政治藍圖，希望徹底改革當時的政治制度。例如顧炎武提出「寓封建立意於郡縣之中」企圖削弱專制的弊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更大力抨擊家天下的傳統，主張恢復三代「公天下」的封建制度。

從上述兩組分析架構來看，顧、黃等明末大儒者的經世思想傾向於「徹底改造政治核心的轉化思想」。

「文鈔」思想與上述的看法有所不同。「文鈔」偏重調適，明儒則傾向轉化。因此前者較踏實，主張依據現況而逐步調整；後者則以封建、井田為理想之寄託，力求全面革新。兩者對於政治權威的態度亦有差異，「文鈔」主張「恪尊王制」，明儒則對當代政治權威提出尖銳的批評。此外兩者另一不同是「文鈔」的經世途徑偏重於採取政治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明儒的經世途徑則以政治核心的基本制度為改革的焦點。

由上述的比較可以看出「文鈔」思想與明儒思想的差異。而且我們發現陸燿在編輯「文鈔」時似乎有意地迴避明儒的意見，「文鈔」學術部分完全沒有收錄顧炎武、黃宗羲兩人的文章，但是卻包含了一些與他們兩人同時，而聲望卻遠不如兩人的作者。唯一有間接關係的文章是張爾岐寫給顧炎武的一封信，名為「答友人書」，文中提及顧氏「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名言，不過卻沒有提到顧炎武的名字。有趣的是「皇朝經世文編」十分重視顧炎武的著作，收錄了顧氏文章九十八篇，此外書中也收錄了張氏的「答友人書」，但標題卻是「答顧寧人書」，由此可見「文鈔」有意不提顧氏的姓名。這很可能是由於顧、黃兩人的作品在乾隆末年仍被視為「禁忌」所致。

但是「文鈔」思想與明儒思想也不是完全無關。上述張爾岐「答友人書」中談到顧氏「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主張，陸燿顯然十分同意這種意見，在「文鈔」的其它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與此類似的意見，亦即講究經史實學，並主張一種踏實而

不尚玄虛的修身工夫。因此就思想淵源而言，「文鈔」編者雖然有意地將本身的經世理論與清初理學連繫在一起，並與明儒的經世思想保持距離，但實際上十七世紀顧炎武等人提倡實學，反對玄虛的風氣仍然對「文鈔」經世思想產生間接影響。

綜合以上的比較我們發現，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經世思想發展的主要方向是從政治核心的改革轉移到關懷政治核心之外的社會性行動。造成這種發展的原因可能有二個，每一，清朝的統治在乾隆年間已經十分穩固，這時提倡政治核心的改革不但不可能而且有高度的危險；第二，從十七世紀以來中國人口高度的成長，使得當時的社會變得大而複雜，也產生了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這二個因素促使「文鈔」迴避政治核心的問題，並關懷地方性和社會性的事務。

其次我們將眼光轉移到十九世紀初年的經世思想，探討陸燿的選擇對「皇朝經世文編」思想之影響。根據個人對「皇朝經世文編」的研究，我們發現兩者在思想內涵上有許多相似之處⁵⁹。最顯著的一點是「兼內外」或「體用合一」的理想亦為「文編」經世理論的核心。此外兩書共同收錄了討論士人立志、讀書、著述、師友關係等問題的文章⁶⁰。再者「文鈔」中所反對的佛道思想、訓誥考證、記誦詞章，以及理學中門戶之見、高談語上、虛偽附會等項在「文編」中均有類似的意見。而「文鈔」反對學校淪為科舉考試的工具、師道不立、士風萎靡等，「文編」亦抱持同樣的看法。

在思想型態方面，「文編」經世思想亦是結合了轉化思想與調適思想而形成以轉化思想為伏流，調適思想為主流的思想趨向。所謂調適思想為主流意指「文編」主張尊重當代政治權威，反對恢復不合時宜的井田、封建等制度，並對當前的弊病提出局部的改革方案。而在上述前提之下的轉化思想則指「文編」主張士人而非君主為真理的終極來源，因此士人可以運用諫諍的方式影響在位者，而徹底改變政治核心；亦可以從本身道德修養和知識追求做起，進而與外在事功貫通為一，以期掃除障礙而實現理想。這種結合了轉化與調適的思想型態與「文鈔」十分類似，因此無論就思想內涵或思想型態而言，我們可以說乾隆末年的「切問齋文鈔」為道光初年經世思想的興起奠定了初步的規模。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文鈔」與「文編」經世思想也有一些差異。主要有以下幾點：

⁵⁹ 拙著，「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以下有關文編的討論均以此研究為基礎。

⁶⁰ 切問齋文鈔與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部分重複收錄的文章計有：張爾岐「辨志」與「答友人書」、姜宸英「與子姪論讀書」與「與從子掌絲書」、李顥「與友人書」、夏之蓉「師說」、韓炎「取友論」等六編。

1. 對政治核心的看法：乾隆末年的「文鈔」有意地避免討論政治核心的問題，但道光初年的「文編」則逐漸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這與嘉道以來清朝中央勢力的衰微不無關係。這種關懷政治核心的趨勢至十九世紀末葉達到高峯，康、梁戊戌變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以政治核心為基礎的徹底改革」。

2. 對「正學」的看法：正學意指正確的學術，乾隆末年和道光初年面對不同的問題，因而採取不同的立場。「文鈔」中的正學為「尊崇程朱、不排擊陸王，並強調理學中重實際的傳統」；而「文編」中的正學則為「消融門戶之見，主張以宋學為本、漢學為末的漢宋調和論」；亦即一為朱陸調和，一為漢宋調和。值得注意的是兩書討論的主題雖然不同，但基本精神卻很一致，皆主張減少學術界內部的紛爭，並將關懷的重點轉移到外在事功。

3. 對讀書的看法：「文鈔」主張研讀經典、史籍、理學著作、「小學」等書，「文編」仍然肯定經典、史籍與「小學」的重要性，但不鼓勵讀理學著作。此外「文編」還主張研讀邸報與當代的著作，同時強調士人應透過親身觀察遊歷或諮詢討論（尤其是與一般平民討論）等途徑獲得知識。由此可見「文編」中重視實際的精神似乎更為強烈。

4. 「文鈔」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而提出的經世思想，「文編」基本上肯定儒家，但是為了適應現實狀況，卻主張採取「權宜之計」，這些權宜之計就某種程度而言已經偏離了儒家傳統。例如「文編」中有些看法認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君子要除去小人可以效法小人所用的方法；為了使人為善可以用名利來引誘人。「文鈔」中完全不同意上述的觀點。再者「文鈔」與「文編」對「福善禍淫」之觀念所採取的態度更有明顯的不同。福善禍淫之說自明末以來由於袁黃提倡「立命說」而大為盛行。「文鈔」中收錄了理學家張爾岐所撰「袁氏立命說辨」，反對袁氏的觀點，認為「福善禍淫」之說「陷溺人心，賊害儒道」；「文編」則收錄了佛教居士羅有高的作品「書立命說辨後」，支持袁氏的觀點並反駁張爾岐的批評，他認為「福善禍淫」之說可以引導中下之人為善，有其價值。這些現象顯示：追求事功精神的高度發展已使道光初年經世思想逐漸偏離了儒家傳統。

以上是將「文鈔」思想放在十七到十九世紀經世思想史之中觀察其特色，我們發現作為一個經世思想家，陸燿在「文鈔」中反映出一種十分特殊的經世型態，他偏重政治核心之外的調適行動，並嘗試將之與核心之外的轉化思想結合在一起，所以他一方面主張地方性和社會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希望徹底改造士人的心志。因

此它與十七世紀側重政治核心的「皇明經世文編」以及顧炎武、黃宗羲的經世思想有所不同；又與十九世紀結合了轉化與調適，但開始注意政治核心改革的「皇朝經世文編」也略有差異。從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由於清人入主以及因人口增加導致社會問題，促使經世思想家迴避政治核心的改革而關懷地方性和社會性事務；而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清中央政府勢力步入衰微，因此以政治核心為基礎的轉化思想又逐漸抬頭；至康、梁戊戌變法而達到高潮。從上述的過程來看，十八世紀「文鈔」所代表的經世型態是頗具特色的。

四、「切問齋文鈔」思想之淵源及其在近世思想史上的意義——代結論

陸耀所編「切問齋文鈔」為乾隆末年經世思想的重要著作，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該書的學術立場環繞著三個選擇。

首先，在中國文化的範圍之內，編者選擇儒家而排斥佛道，故書中主張積極入世，要求以個人道德修養為基礎進而追求天下之治平。同時它反對佛道的消極避世，高談語上，以及以「福善禍淫」之觀念導引世人為善；它亦反對晚明以來十分流行的三教合一之主張。總之，「文鈔」經世理論是以儒家思想為其基本立場。

其次，在儒家思想的範圍內，「文鈔」對宋明理學抱持著愛憎交雜的態度。因此它批評理學中門戶之見、高談語上、虛偽附會等風氣。為了挽教程朱、陸王互相排擊之風，「文鈔」主張放棄門戶之見，採取尊崇程朱但不攻擊陸王的調和態度。為了解決高談語上、虛偽附會之弊，「文鈔」要求返回先秦儒家平實而不尚玄虛的修身工夫，並以顧炎武「行己有恥」一語作為行為的準則。不過「文鈔」並沒有完全放棄理學所強調的道德形上學，只是認為應該「下學而上達」，亦即從具體的道德行為開始逐漸地進入「天人之微」，不可以只知心性天道，卻忽略道德實踐。此外「文鈔」還強調理學中重視事功的一面，書中舉出朱熹、陸九淵、王陽明在事功上的表現，以此作為儒者之楷模。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發現「文鈔」一方面批評理學的弊病，另一方面又繼承了一部分理學的精神。再者對於儒學傳統之內的詞章之學和考據訓詁書中皆表不滿，編者最強調的選擇是注重事功的「經世」。

第三在經世思想的範圍內，「文鈔」偏重於調適性的目標，並以核心之外社會性行動為方法來實現此理想。在目標方面，「文鈔」認為個人最高的理想是成聖成賢，但若無法成為聖賢則作一「醇儒」或有為有守的地方官亦值得尊敬；至於羣體

的理想，「文鈔」罕言三代，僅希望在郡縣制度之下逐步改革當前的弊病。在方法方面，「文鈔」主張藉著出版書籍影響他人的觀念，或透過學使、教師、朋友三個角色的努力改革教育方面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文鈔」亦有轉化的理想，希望徹底改造士人的心志，而樹立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精神。因此「文鈔」學術部分的經世思想結合了核心之外的「調適」與「轉化」兩種趨向，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思想型態。這種思想型態與十七世紀強調政治核心之改革的「皇明經世文編」與顧炎武、黃宗羲等明儒的經世思想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又為十九世紀初年經世思想的興起奠下初步的基礎。

綜觀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經世思想的演變，我們發現十七世紀的經世思想主要關懷政治核心之改革；至十八世紀由於清朝政治勢力的穩固與社會的複雜化，經世思想的重心轉移到政治核心之外的調適性行動；至十九世紀初年，經世思想仍以核心之外的調適行動為主流，但是由於清朝中央勢力的衰微，促使士人重新思考政治核心的問題，重視政治核心的經世思想逐漸發展，這種趨勢至戊戌變法而達到高峯。在上述三百年的歷史演變中，「文鈔」所代表的經世型態毋寧是頗具特色。

在了解「文鈔」學術立場之後。我們希望進一步地了解其思想淵源。第一種假設是「文鈔」思想源於宋明理學，這種看法值得商榷。前面曾談到「文鈔」對宋明理學抱持著愛憎交雜的態度，它一方面批評理學，另一方面又繼承理學，這種觀念與理學已經有所不同。例如宋明理學中「道德形上學」居於首要的地位，「文鈔」雖然從「下學而上達」的觀點肯定形上學的意義，但它對具體道德行為的重視遠超過形上學。又如宋明理學肯定事功的價值，但只是整體思想中的一小部分，「文鈔」卻特別強調這一部分，並舉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為例說明事功之表現是理學的真精神。總之「文鈔」選擇性地強調理學中具體的道德行為與事功的重要性，已與宋明理學的原貌有所不同。此外「文鈔」所強調的出版或調適性的教育改革方案亦與理學思想有明顯差異。因此「文鈔」思想雖然有一部分可以溯源到宋明理學，但並非由宋明理學直接產生。

第二種假設是認為「文鈔」思想淵源於清初程朱理學，這種看法很容易找到一些證據。例如「文鈔」學術部分的作者幾乎囊括了康熙時期的程朱理學家，因此編者似乎有意地將「文鈔」的經世理論奠立在清初理學之上。但是這種看法仍然值得進一步分疏，為了較清楚地掌握清初理學與乾隆末年經世思想之關係，我們嘗試將清初程朱理學的代表著作——「性理精義」與「文鈔」作一比較^⑥。「性理精義」

編於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全書內容如下：卷一為周敦頤之「太極圖說」、「通書」；卷二摘錄張載的「西銘」與「正蒙」；卷三選自邵雍「皇極經世」；卷四、五、六分別是「易傳啟蒙」、「朱子家禮」和「律呂新書」；卷七、八為論學；卷九論性命；卷十論理氣；卷十一、十二論治道。上述內容顯示「性理精義」除了討論抽象的太極、理氣、性命之外也包括較具體的家禮、學、治道等項。觀察該書「學類」與「治道類」之細目，更可看出清初理學中的實際精神：

學類：小學、總論為學之方、立志、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人倫、讀書法、文藝。

治道類：總論治道、君道、臣道、用人、田賦、學校、宗廟、禮樂、兵政、刑罰、諫諍、禎異。

我們發現以上各項均為「文鈔」十分重視的主題。其中就學類而言，強調立志力行、討論讀書方法、主張研讀「小學」等，更是「文鈔」學術部分反覆提倡的重點。因此我們認為「文鈔」的經世思想為清初程朱理學的進一步發展。

所謂進一步發展，意指「文鈔」與「性理精義」之間仍有明顯的差異。第一，「性理精義」中有關太極、陰陽五行、性命、理氣等項的討論，仍佔相當重的比例。「文鈔」則拋開這些抽象問題，將焦點轉移到「性理精義」中「學類」和「治道類」兩部分。第二，「性理精義」推崇朱子，堅守程朱學派；「文鈔」則不具有強烈的宗派意識，書中甚至蒐集了多篇陸王學者的著作，這種寬容的作風受到清中葉一位宗派意識十分強烈的學者唐鑑（一七七八～一八六一）的批評，唐氏對「文鈔」收錄陸王學者邵廷采的文章深表不滿，這種批評更加烘托出「文鈔」宗派意識的薄弱^⑩。

從上述的比較可以發現「文鈔」較「性理精義」更具實際精神。但是我們接著要問這種實際精神是怎麼產生的？至少有二個因素值得思考。首先，根據陳榮捷先生的研究，從宋明理學長期的演變來看，有逐漸由抽玄轉入具體的傾向，例如宋代理學家十分重視「太極」的問題，將之視為理學形上學之起點，朱熹和陸九淵對於「無極而太極」一語爭辯尤多；但是至明代理學家對「太極」之課題殊少用心，他

^⑩ 以下有關性理精義的討論參考 Wing-tsit Chan "The Hsing-li ching-i and the Ch'eng-Chu School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⑪ 唐鑑談到「（文鈔）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惟學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書，自附於文中子焚經之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功令乎，先生（陸燿）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歟！」，見清學案小識（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版），卷八，頁二六〇。

們捨棄太極等抽象問題，而專注內在修養；至清初理學家更進一步地將實務置於玄談之上，捨太極而傾於日用之常。「文鈔」對實務的重視，可以放在這一條歷史脈絡來觀察。其次還有一個因素亦不容忽略，十七世紀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提倡「實學」，講求「經世致用」，這種精神和清初程朱理學中重實際的傾向互相激盪，而共同鑄造出當時之風氣。前文曾談到張爾岐所撰「答友人書」與顧炎武討論道德問題，而歸結到「行己有恥」一語，這個現象顯示十七世紀理學家與經世學者密切交往而相互影響。因此陸燿在「文鈔」中雖因政治因素有意迴避顧、黃等大儒的意見，實際上仍受十七世紀實學思潮的間接影響。

從宋明以來思想發展過程來看，宋明理學與清代學術思想之關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余英時先生曾經從「內在理路」的角度闡明宋明理學與清代考證學之關係，認為理學中程朱、陸王之爭促使學者回到儒家經典去找立論的根據，於是義理之是非取決於經書，而逼出了清代的考證學。但是清代學術思想的主流除了考證之外，首推經世，尤其是道咸以後經世之風更是波瀾壯闊，它與宋明理學有何關係是一個十分值得思索沈吟的課題。顧炎武力斥理學空虛，認為理學家「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其他學者均對理學形成一「刻板印象」，認為理學家只知探求性命天道，而不顧生民休戚。然而本文的研究卻顯示理學與經世並非矛盾或對立的，清初理學直接推動了清代經世思想的發展。如果從余氏所謂「內在理路」的角度來看，宋明理學長期以來逐漸地由抽象轉入具體，至十七世紀在「實學」思潮的激盪下，清初理學家重視實際的傾向益為強烈，因此學者們逐漸地對理學內部程朱、陸王之爭感到厭倦，他們不再討論最易引起門戶紛爭的心性或理氣等形上學的問題，轉而將焦點貫注於程朱、陸王兩派共同肯定的外在事功；另一方面又從「體用兼備」或「明體達用」的觀點說明事功與內在道德修養的貫通關係。這一套想法使理學精神「外轉」，開創出一條通往經世的道路，清代具有理學淵源的經世學者如陸世儀、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邵廷采等人的思想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加以理解。而陸燿所編輯的「切問齋文鈔」更是典型的代表。

在「切問齋文鈔」的影響下，道光初年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此後「續編」、「三編」、「四篇」、「五篇」、「新篇」等書接踵而出，帶起了經世思想之浪潮，「文鈔」之影響可謂深遠。過去學者解釋近代經世思想興起原因時多強調清代今文經學復興的重要性，然而今文學的影響要到道咸以後才較為顯著。因此追

溯清代經世思想之淵源，宋明以降理學內部演變所逼出的經世精神或許更具關鍵地位。

附 錄：

「切問齋文鈔」學術部分作者背景表：

姓 名	籍 貫	生 卒	功 名	官 位	學術淵源	選入篇數	備 註
張爾岐	山東濟陽	1612~1678	無	無	程朱	3	
陸隴其	浙江平湖	1630~1693	康熙九年進士	知縣 四川道御史	程朱	2	
湯斌	河南睢陽	1627~1687	順治六年進士	工部尚書	朱陸 調和	2	
田蘭芳	河南睢陽	1628~1701	諸生	無	朱陸 調和	3	
邵廷采	浙江餘姚	1648~1711	諸生	無	陸王	2	見姚名達著，邵念魯年譜（臺北，商務印書館）
陳道	江西新城	1707~1760	乾隆十三年進士	以親老不仕	朱陸 調和	1	專宗濂洛，兼資陸王。見清史列傳，卷六七。
李光地	福建安溪	1642~1718	康熙九年進士	大學士	程朱	1	
陸奎勳	浙江平湖	1663~ ?	康熙六十年進士	翰林院檢討	程朱	1	不攻陸王
張伯行	河南儀封	1652~1725	康熙二十年進士	禮部尚書	程朱	2	
計東	江蘇吳江	1626~1677	順治十四年舉人	無	文人	3	從湯斌講學，主程朱但同情陸王
姜宸英	浙江慈谿	1628~1699	康熙三十六年進士	翰林院修撰	文人	3	與計東為友
朱彝尊	浙江秀水	1629~1709	布衣，博學鴻詞	翰林院檢討	文人 史家	1	
徐乾學	江蘇崑山	1631~1694	康熙九年進士	刑部尚書	官吏	1	顧炎武的外甥
韓 荻	江蘇長洲	1637~1704	康熙十二年進士	禮部尚書	官吏	1	
王 鉞	山東諸城	約死於康熙40年(1701)，年81	順治十六年進士	西寧縣知縣	文人	1	
勞 史	浙江餘姚	1655~1713	無	無	程朱	1	耕讀不仕
彭定求	江蘇長洲	1645~1719	康熙十五年進士	翰林院侍講	陸王	1	
武在洛	山東益都	不詳	不詳	歷城縣教諭	不詳	1	
潘 相	湖南安鄉	1713~1790	乾隆二十八年進士	濮州知州	官吏	2	尊程朱
黃之雋	江蘇華亭	1668~1748	康熙六十年進士	內閣中書 福建提學	文人	1	尊程朱
沈起元	江蘇太倉	1685~1763	康熙六十年進士	光祿寺卿	官吏	1	
孫奇逢	河北容城	1585~1675	明萬曆二十八年舉人	無	陸王	1	
杜 濬	湖北黃岡	1611~1687	明副榜貢生	無	詩人	1	
魏裔介	河北柏鄉	1616~1686	順治三年進士	大學士	程朱	1	
黃中堅	不詳	不詳	蘇州府學貢生	不詳	不詳	1	
蔡世遠	福建漳浦	1682~1733	康熙四十八年進士	禮部侍郎	程朱	2	協纂性理精義顧炎武的學生
潘 耒	江蘇吳江	1646~1708	布衣、博學鴻詞	翰林院檢討	史家	1	

魏象樞	山西蔚州	1617~1687	順治三年進士	刑部尚書	程朱	2	
熊賜履	湖北孝感	1635~1709	順治十五年進士	大學士	程朱	1	
沈德潛	江蘇長洲	1673~1769	乾隆四年進士	禮部尚書	詩人	1	
陸世儀	江蘇太倉	1611~1672	無	無	程朱	1	
夏之蓉	江蘇高郵	1697~1784	雍正十一年進士	翰林院檢討	文人	1	
方舟	安徽桐城	1665~1701	不詳	不詳	文人	1	方苞的哥哥
李顥	陝西葭州	1627~1705	布衣	無	陸王	3	堅苦力學，無師而成
張履祥	浙江桐鄉	1611~1674	明諸生	無	程朱	1	